

求索集

买买提祖农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求索集

买买提祖农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石晓奇

封面设计 巴 图

求 索 集

买买提祖农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乌苏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625 印张 2 插页 100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600

ISBN7—228—03498—8/1·1263

定价:7.50 元

目 录

社会主义维吾尔文学的巨大发展.....	(1)
从文化交流看古代新疆与中原地区的关系	(10)
论新疆文化艺术的发展	(17)
浅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文艺观	(22)
丝路腹地旋律之源——维吾尔民歌	(35)
论中国维吾尔族民俗活动形式	(48)
中国维吾尔族与十二木卡姆	(74)
古曲新唱五洲——《十二木卡姆》出版的前前后后	(78)
谈谈诗歌创作中的个性和艺术风格问题	(88)
典型形象论	(92)
时代精神的响亮歌声.....	(105)
短篇小说《锻炼》的艺术特色.....	(111)
历史剧创作中的一些问题——评歌剧《热碧亚—— 赛丁》	(117)
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方向,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事业.....	(127)
团结 奋斗 改革 繁荣民族文化艺术.....	(132)
服从大局 扎实工作 努力开创我区文化工作新 局面.....	(134)

社会主义维吾尔文学的巨大发展

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30 周年。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们热烈欢呼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原则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根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30 年来的实践证明，在新疆实行自治制度，保障了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发展了以平等、团结、互助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新疆和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使新疆各少数民族同全国其他各民族一样，大踏步地走上了共同繁荣、振兴的道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在新疆民主改革全面结束，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所推行的民族剥削制度被彻底废除，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成立的。因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使新疆各项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景象。文学艺术领域也不例外。维吾尔文学艺术事业的巨大发展，充分显示和发挥了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及其作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实现文学艺术为工农兵服务，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在新疆逐渐形成了以宣传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民主与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其著名代表人物就是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

到30年代中期，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党中央派遣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优秀共产党员来新疆工作。他们宣传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团结新疆各民族文艺工作者，领导了以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为中心的隆隆烈烈的革命文艺活动，从而使新疆各民族的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各民族的年轻的诗人和作家。维吾尔人民的爱国主义战士、诗人、剧作家鲁特普拉·穆特里夫便是这一时期最优秀的代表人物。

到1944年，新疆爆发了作为中国革命一部分的三区革命。这一革命的影响波及全疆，不少革命文艺工作者投身于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行列。在斗争中涌现出像祖农·哈迪尔、艾里喀木·艾合太木等一批优秀作家和诗人。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歌颂了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的英勇斗争精神，表现了各族人民对中国解放的渴望心情。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学艺术究竟为什么人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在指导思想上还不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维吾尔文学才开始了自己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讲话中所提出的马列主义文艺原则，已成为新疆各民族文艺工作者的行动指南。

自治区成立以后，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使用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字，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确立了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原则。

在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就要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就要为新疆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新疆各族人民像全国人民一样，要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这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但是，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斗争形式不尽相同，他们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以及他们的感情、性格等方面都具有各自的特点。所以，文艺只有为新疆各族人民，为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才能更好地发展各族人民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才能使祖国的文艺园地更加万紫千红，欣欣向荣。

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方向明确，政策得到了落实，所以维吾尔文学艺术领域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根本性变化的重要特征是：维吾尔族的文艺队伍迅速成长了起来。这支队伍中的作家、诗人深入工农兵群众，在学习马列主义、了解社会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为各族人民奉献出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从而促进了各族人民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

30年来，如同民族区域自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那样，文艺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自治机关在管理自己具有民族形式、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事业中受到了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和影响，尤其是那种忽视和不尊重民族平等权力和民族区域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力的“左”的错误倾向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的后果更是相当严重的。维吾尔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7年。维吾尔新时期文学是同新中国一起诞生，一起发展的。

作家和诗人满腔热情地投身于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去，讴歌新中国、讴歌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的 1956 年，由于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视培育各民族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这一奇葩，使各民族作家深受鼓舞。同时，强调了要按文艺规律办事，广泛发扬文艺民主，使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春色满园的景象。但是，由于 1957 年开展的反右派、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的严重扩大化，使大批作家和有一定才能、富于开拓精神的中老年作家受到打击，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也蒙受严重损失。到 1958 年，由于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的盛行，弄虚作假，文艺创作严重脱离生活等坏风气充斥文艺领域，结果概念化、公式化的文艺作品以及受到各种条条框框束缚的文艺理论应运而生，文学创作的路子也就越来越窄了。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党于 1961 年、1962 年曾两次调整了文艺政策，重新落实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从而使新疆文学艺术事业重新活跃起来，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兴旺景象。但没过多久，又开始了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一些作家再次受到错误批判。文学艺术上的“左”倾路线愈演愈烈。

在这 17 年中，虽然党的民族政策、文艺方针受到“左”的倾向的破坏和干扰，但由于“左”的错误在当时的整个局势中还未居于主要地位，大多数时间基本上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党的一系列文艺政策，所以各民族的文艺事业仍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锻炼》（小说集，祖农·哈迪尔）、《祖国恋》（诗集，尼木·谢依迪）、《希望的波涛》

(诗集，艾里喀木·艾合太木)、《和平之歌》、《唱不完的歌》(诗集，铁依甫江·艾里尤夫)、《喜事》(话剧，祖农·哈迪尔)、《火焰山的怒吼》(话剧，包尔汉·谢依迪)、《绿洲凯歌》(电影剧本)，大型歌舞《人民公社好》，这是这 17 年的产物。

第二个阶段，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段时间是少数民族新时期文学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形成了一个既没有小说，也没有诗歌，也没有评论的局面。但各民族作家即使在遭受这种凌辱、打击的情况下，仍然加深对生活的认识，对未来寄以极大的希望，继续努力探索，进行文学创作。

第三个阶段，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有利于民族区域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增强民族团结的重大政策都用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通过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落实政策，处理文艺方面的冤、假、错案，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使新疆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区的文艺创作，不论从数量、质量上，也不论从题材的广度、形式和形象的多样，还是从深入表现时代精神上来说，都是同“四人帮”横行时期无法比拟的，可以说是大大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的 17 年。

更使人感到高兴的是，文艺队伍更加发展壮大，一大批中青年作家跻身于文艺创作的行列，给文艺战线带来了新的活力。目前，中国作协新疆分会已有会员 292 名。经常为协会创办的《塔里木》文学杂志提供稿件的维吾尔作者就有近 500 名。这是一支庞大的创作力量。在文学创作方面，一个百

花争艳、全面繁荣的春天已经到来。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用维吾尔文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有10部，中篇小说3部，小说集1000部，诗歌集100多种，18个剧本以及许多歌曲和理论文章。这在维吾尔文学史上都是空前的。使人感到高兴的另一种情况是：诗歌创作历来在维吾尔文学中是占据主要比重的，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说创作已从单一题材发展到写中篇、长篇以及系列小说。克尤木·吐尔迪的系列小说《战斗的年代》，祖尔东·萨比尔的《阿勃腊勒的风》、《探索》，阿布都热合满·卡哈尔的《伊犁的浪涛》等长篇小说，艾海提·吐尔迪的《涛涛河浪》等中篇小说也相继问世。在诗歌创作方面，不但创作了一批富有哲理性的抒情诗，而且还写出像《喀什噶尔之夜》、《伊犁儿女》、《古勒米柔依》、《戴着白色头巾的仙女》等长诗。作为我们薄弱环节之一的话剧和文艺评论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创作和涌现出诸如《血腥年代》、《热碧亚——赛丁》、《阿曼尼莎》、《塔西瓦依》、《倩牡丹》等一些较好的剧本和一批有才能的剧作家、评论家。电影艺术的发展也很快，像《热娜的婚事》、《幸福之歌》、《不当演员的姑娘》等电影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在文艺创作上有新发展、新突破的，大都出自青年作者之手。这在我区文学创作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区目前的文艺时期已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

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发展水平，不仅要看这个民族文艺作品的数量，而且也要看它的质量。而衡量质量的重要因素，一是典型形象，二是各种艺术风格和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这两种因素是各民族文艺臻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以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维吾尔文学来说，塑造得成功或者

比较成功的艺术典型虽然暂时还不多，但这方面的成就却已经显示出年轻的维吾尔社会主义文学的巨大生命力。

老作家祖农·哈迪尔在小说《锻炼》里成功地塑造了麦提尼牙孜这一形象。麦提尼牙孜的形象是一个看得见、想得到的形象，是一个真实感人、具有共性和民族特色的典型形象。这个形象的塑造，是当今维吾尔文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之一。通过麦提尼牙孜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维吾尔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维吾尔农民的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作家克尤木·吐尔迪在长篇小说《战斗的年代》描绘了从1949年到1955年这一阶段维吾尔人民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小说中阿勒玛斯的形象是一个塑造得较为成功的形象。其典型性在于作者通过一系列典型事件的描述，展示了阿勒玛斯这样一个贫农的儿子在解放战争和三区革命影响下逐步觉悟，走了革命道路的过程，给维吾尔族人民指明了革命道路。

祖尔东·莎比尔在长篇小说《探索》中塑造的艾拉的形象是塑造当代青年形象中一个成功的典型形象。小说以“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为背景，叙述了青年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辛酸的身世以及为实现科学兴国的伟大理想而付出的辛勤劳动。阿迪勒的形象是被当作一个具有独特性格的形象来塑造的，在他身上洋溢着浓重的时代气息，形象生动感人，在各族青年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我们可以把艾拉的形象看作是新时期文学塑造当代人形象的一个良好开端。另外，还有很多作家把塑造典型形象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中心点，努力摸索着塑造既闪烁时代精神的光芒又具有共性和个性的典型形象。

社会主义维吾尔文学的不同艺术风格已经形成，并得到发展，出现了一个各种风格相互影响、相互竞争，促进共同繁荣的大好局面。这是新时期维吾尔文学繁荣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维吾尔人民具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的前辈创造了《乌古斯传》、《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等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我们的很多作家和诗人植根于新生活的土壤之中，摄取维吾尔古典文学的营养，吸收汉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精华，发扬创造精神，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充分体现了这种风格的民族特色和个性。如拿祖农·哈迪尔的艺术风格来说，他善于在自己的作品里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矛盾，因而他写的小说如民间文学一样，情趣盎然，别具一格。同时，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幽默诙谐，人物形象充分体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特有的气质。

诗人铁依甫江·艾里尤夫艺术风格的特点是：他能深刻地反映时代的具有深刻意义的主题和典型感情。他的诗创造性地渗透着维吾尔古典诗歌和民谣的特点。他的诗作，语言通俗易懂、生动流畅、韵律和谐、丰富多变。

诗人艾里喀木·艾合太木诗歌风格的特点是：他写的诗富于感情，形式严谨，意蕴深远，选用的语言，声调和谐，琅琅上口。

诗人阿布都克里木·霍加的诗，意境深沉含蓄，表现手法新颖，不落俗套。

诗人买买提力·祖农则善于反映生活矛盾中的细节和群众中的社会问题。同时他的诗作，形式变化多样，内容丰富深厚。

作家克尤木·吐尔迪善于把人物置于历史背景下，围绕着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通过典型情节的描写来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

作家祖尔东·莎比尔则善于把人物放在现实生活中特定的、极为复杂的矛盾中去加以描述，善于描述人物的性格特点。同时，他对作品中的语言能做到精饰细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新时期维吾尔文学中，创造了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和诗人还有许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新增加到我们文学队伍里来的很多中青年作家以马列主义世界观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对创作的决定性作用。他们认真学习老作家的创作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正在为确立自己文学独特风格而辛勤地耕耘着。

在自治区成立的30周年内，社会主义维吾尔文学蓬勃发展，到今天已经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是维吾尔族作家对祖国新时期文学做出的伟大贡献。

在新的历史时期，只要我们更加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并坚持这条路线，使文艺创作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中焕发我们的创造性精神，努力提高我们精神产品的质量，年轻的社会主义维吾尔文学就一定会攀上更高峰，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茜草译）

从文化交流看古代新疆与 中原地区的关系

史学研究和文学工作者的基本任务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阐述历史，正确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向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提高各族人民共同繁荣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发展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但是，近年来吐尔贡·阿勒玛斯同志出版的三本书，即《维吾尔人》、《匈奴简史》、《古代维吾尔文学》，则违背了以上原则，不仅如此，他还歪曲历史事实，甚至用伪造历史的手法，来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否认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的客观事实，散布民族分裂主义思想。

他别有用心地写道：“我们的祖先从有史到公元14世纪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建立了强大、富裕、文明的国家。”（见《维吾尔人》第1页）甚至胡说什么“中国的边界在长城以内”（见《维吾尔人》第35、233页）；“维吾尔王朝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活动，是通过派遣使节进行的”（见《维吾尔人》第305页）；“维吾尔王朝和中国的官吏没有附属关系”（见《维吾尔人》第823页）。妄图以此否定我国西汉中叶起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历史事实。鼓吹民族分裂主义思

想。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决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吐尔贡·阿勒玛斯的谬论完全是无稽之谈。众所周知，新疆古称西域，远在汉代就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公元前 59 年（西汉神爵三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以来，历代中央王朝都在这里设立军政管理机构，进行有效的管辖。西域与中央王朝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新疆各族人民与中原各族人民共同谱写了历史篇章，共同创造和发展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古代新疆与中原文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流，远在公元前 2015 年，西域民族就与夏朝有了文化交往。公元前 11 世纪，周穆王的西游，更促进了民族间的友谊。从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来看，汉代古窟中已出现有来自先秦中原音乐的笙、簧、琴、排箫等许多乐器。在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以及吐鲁番、哈密等地出土了许多中原战国、西汉时期的铜镜以及丝织物，说明，西域文化自公元前的 1 000 多年前就已开始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西域三十六国与中原文化交流则更频繁。当时，西域与中原的服饰有很多相同之处。匈奴的兴起，则使西域各民族与中原文化联系越来越密切。随着文化交往的扩大，在汉代“于阗乐”就已传入中原，且在宫廷中演出。李延年根据张骞带回的“摩诃兜勒”音乐，创作了二十八解，对中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西域乐舞艺术传入中原后，颇为流行，汉灵帝时好“胡服”、“胡饭”、“胡舞”等，促进了西域文化的东渐。

同时，中原文化也传入西域。公元前 110—105 年，汉武

帝以江都王刘健的女儿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猎骄靡。之后，又把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翁归靡。随行中有不少汉族艺术家、工匠等。公元前69年，解忧公主又派女儿到长安学习鼓琴，返回时，与龟兹王结婚。自后，龟兹王与夫人多次入朝，津津乐道汉文化，从而促使了中原文化在西域的推广。

晋代，吕光将龟兹乐舞首次带入中原，到南北朝时，龟兹乐在中原广为流传。公元5世纪时，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安国乐、悦般乐陆续传入中原，且广为传播。

隋代，制定的《七部乐》和《九部乐》中有不少西域音乐。龟兹乐中就分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三种，形式多样。在龟兹乐中既有来自西亚文化的影响，如琵琶、箜篌等乐器就是从两河流域经波斯传入西域，后又传到中原的。另一方面，中原汉族乐器，如笙、簧、箫等也在龟兹壁画中出现，而且在龟兹乐中广为使用。

到唐代，西域音乐几乎一统天下，《十部乐》中有六部来自西域。龟兹乐列入榜首！唐代鼓舞曲几乎全用的是龟兹乐。西域文化深受中原人民喜爱。唐代大诗人元稹有《法曲》诗为证：

“女为胡妇学胡妆，
伎伎胡音务多乐，
《火凤》声沉多咽绝，
《春莺啭》罢长萧索。”

其中《火凤》曲是疏勒音乐家裴神符创作。《春莺啭》是龟兹音乐家白明达创作。这二首乐曲作为唐代中原音乐“胡”化的代表，说明西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发展，有过很深

的影响。

龟兹乐在天宝四年（即公元745年）还传到西南地区。云南流传有龟兹乐，《新唐书》中有记载。这不仅说明艺术之间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其意义是重大的。

西域艺术家在汉、唐文化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如龟兹音乐家苏祇婆、白明达；收勒音乐家裴神符、裴洛儿；于阗音乐家尉迟璋，美术家尉迟乙僧父子以及曹国、安国、康国、史国、何国、穆国等艺术，仅有名记载就有一百五十余人。西域艺术家活跃在中原，大大促进了民族文化间的广泛交流。

同时，中原文化也向西传播。在千佛洞中所画的景物，有不少古代神话人物，就是中原景物。吐鲁番出土文书，说明汉文字在西域广为使用。坎曼尔诗签、诗经等抄本的发现，说明中原文化对西域也有很深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教，也传入西域，并且在吐鲁番一带盛行。从出土丝织物上也可明显看出有中原的珠联对兽图案。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说明汉文化对西域民族的影响。和田出土的陶制俑，更可看出各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互相影响、灿然并存。

综上所述，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在唐代进入繁盛阶段，其原因是唐朝有效地统辖着广大西域地区。如公元657年，唐朝统一西突厥，设立了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公元658年，唐朝又在西域设立了焉耆都督府、龟兹都督府。公元675年设立疏勒都督府，并在于阗设置毗河都督府。公元658年后，安西都护府定于龟兹。

宋代，西域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仍很密切。于阗李氏王朝仍使用汉族式的年号，称唐朝为大朝，与中原宋朝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喀喇汗王朝的建立，在西域史上尤